

官员为何不会说话

文\正言

想起“一要吃饭二要建设”

文\亦菲

论语中国



“它(比赛录像)让我想起了那些无法复制的瞬间。”

11月23日,张宁、高峻、杨维、张洁雯、魏轶力和陈郁等6名羽毛球世界冠军退役,张宁难抑心中的激动。



“中国人均GDP在世界的100名以后,我们还没办法去英雄救‘美’!我

预计本次金融危机2至3年内就会过去,从2011年开始将迎来世界经济的复苏。”

11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在“2008小谷围(岛)金融论坛”上谈金融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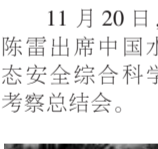
“不光是我,我们这一代没有一个人参军,可能爷爷也会有些遗憾吧。”

11月21日,主持人柯蓝作为革命先辈的家属,应邀参加中央电视台电视连续剧《浴血坚持》新闻发布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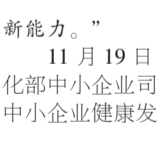
“50年后东北黑土区1400万亩耕地的黑土层将流失掉,粮食产量将降低40%左右,35年后西南岩溶区石漠化面积将翻一番,届时将有近1亿人失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11月20日,水利部部长陈雷出席中国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综合科学考察组科学考察总结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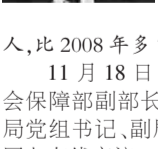
“今年部分地方和部分行业中小企业出现生产经营困难,就是缺乏创新能力。”

11月1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司司长王黎明谈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报考2009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招考公务员考试的人数约是77.5万人,比2008年多13万多人。”

11月18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国家公务员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杨士秋与网友在线交流。



“今天有些中国学者,还喜欢用阴谋论来看问题。觉得事情背后肯定有阴谋。比如说油价高,我们非要是国际财团的投机;投行不行了,他们就说什么赌博输了。”

11月17日,中央电视台主播芮成钢做客搜狐网。

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前院长吴建民署名文章,提出中国的国际形象被扭曲,既和外国媒体的报道有关,也和中国官员不会说话有关,批评一些中国高官不懂得如何同外国人交流。并分析认为,造成这种现象,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自古中国人的哲学是“敏于行,讷于言”,“能说会道”的人容易被批评为夸夸其谈,而不善表达的人倒成了人们表扬的对象;我们当前的学校和家庭教育也过分重视考试成绩,忽略了交流能力这一基本素质的培养,以至于一些人习惯把自己“藏”起来,认为言多必失,不如打些哈哈,把大量时间浪费在充满套话、废话和空话的无效交流上。

文章发表后,引起网友一片哗然,力挺者居多。但让笔者纳闷的是,为何又是一个“前大使”、“前院长”在发言,像极了前一段的前卫生部官员、前教育部官员“临终”前的肺腑之言?其在任时缘何不及时地为国内同胞提些醒呢,难道也深谙“藏”起之道?

其实,说中国官员不会说话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国内,习近平同志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曾指出:“在开展群众工作方面,我们有的领导干部甚至不会说话,处于‘失语’状态——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

如此看来,吴建民举例所说,“有的代表团,万里迢迢到国外招商,请了很多人,介绍自己的省份或者城市,结果一上台先说天气,‘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来到美丽的巴黎,巴黎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好不容易讲到正题了,又是一大堆让人云里雾里的话语”就见怪不怪了。

毕竟,在国内就不怎么会说话的人,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你还指望他能句句珠玑、言语得体吗?他不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职工芦涛公然对一名男

子实施殴打并称“我是法院的,我代表国家罗汉,花100万弄死你这个农民”;不像广州市一卫生局官员口无遮拦地说:“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难是中国”;不像湖南巨贪李大伦坦言:“在郴州,我李大伦说了算”那样,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当然,把“不会说话”的板子全部打在官员身上,也未免有些以偏概全了。终归,在中国几千年的官场文化中,“慎言”几乎已成行规。且不说孔子的“慎其言也”,孔子之后的韩非子,也写了一篇文章叫《说难》,洞照纤微地剖析了向国君谏言难,向领导进言难,向上司建议难,向朋友和同事提意见难的问题,提出了“说之难”,但终未免因说获罪而致死。后来,世人就“聪明”多了,以清朝身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大学士的显宦曹振鏞为例,缘何其备受皇帝恩宠,死后还获得“文正”的谥号,并入了贤良祠?是他干出了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吗?清人朱克敬《曝闻二识》披露其自白云:“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再近些,今年7月,教育部原发言人王旭明卸任后,也曾对记者袒露心声:“我没傻到不懂官场规则。现在要想当官还是不说话或少说话,这样可以减少争议或减少说错话的机会,这样可能对公务员的升迁有利。”

看来,多磕头,少说话;不会说话,就说废话,“欲赋新词强说愁”,原本就是“为官之道”!虽然会赔笑大方,但毕竟比讲真话少些危险。不信你看看明史专家吴晗,明明是按照毛泽东同志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写出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罢官》等文章和剧本,却被人捕风捉影地将其文诬陷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

株毒草”,吴晗本人也被扣上“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最终被迫害致死。不信你再看看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林嘉祥,如果不是在公众场合高呼“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想必深圳市公安局连“不构成猥亵儿童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仅为酒后行为不当”的结论都不一定会给,更不用说被交通运输部暂时免职了。当然,这个林嘉祥是万万不能与吴晗相提并论的。只是,在当下的官场上,林嘉祥又为一些为官者“慎言”提供了一个佐证。

说话难,说实话更难,在一定位置讲实话难上加难。为难之时,不由得想起一则旧事来,也与外交有关。

一次,一位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访华。邓小平同志对他说:“你们说向我们学习,这是友好的话。但中国的做法只能供你们参考,你们要走自己的路。我看,你们现在不能搞社会主义。”客人听后先是一阵惊讶,之后又感慨万千,说一位领导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袖,建议他们不要搞社会主义,而是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这才是真正的朋友!(见李肇星《从未名到有名》,青岛出版社)

李肇星回忆说:“那个国家面积只有三万多平方公里,有我国海南省那么大,人口是海南的三分之一,90%的工业品靠进口,60%的粮食靠进口,主要靠出口劳动力和资源为生。如果劝这样一个友好国家立刻按中国的样子去搞社会主义,说不定会害了人家。”

实话实说,说的人坦言相告,才能赢得听话人的尊重。实话实说者,伟人也!

先锋杂文

任何愉悦的感受,这样的阅读同样需要读者的精神走向来配合,读者关注什么样的题材和领域,读者有没有直面历史的勇气。

鲁迅曾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也许有人说这样的观点适用于黑暗的年代,但是在光明的年代,心灵的指引同样重要。打量一下我们的周遭,很长时间以来,谈学精神、作品思想、作家责任感为许多研究者所不屑,同时也被不少作家和出版社不屑,这样的氛围直接导致的是精神产品的品质越来越低下。我们关注畅销书,关注个人的小情小趣,或者是知识的传播和复述,唯独原创性的、可以触动人心灵的东西非常缺少。

在现代社会,我们把文学的尴尬与彷徨解读为文学回归到本位,对文学最重要最核心的精神的丢失视为理所当然。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不管是文学创作者还是出版者和阅读者,似乎达成了一种共识,文学的精神被忽略、被抽离,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重拾作家的社会责任感,重新定位作家和读者的精神走向,在当下,不仅必需,而且必要。

天下思想

重拾作家责任感

文\杨青

曾几何时,作家的精神走向、社会责任感和作品的社会影响力几乎是对作家和作品的唯一评判标准。但是世易时移,时至今日,社会责任感和作家的精神走向好像成了一个过时的名词被远远抛到了脑后。

前两天看到媒体上有人提及要通过阅读表达我们的公共责任,不然这个社会会变成沉默、冷漠的社会。提议者的意图无非是想把私人化的阅读视线放宽泛一些,视野更广阔一些,而关注点也更由小我拓宽到大我。

其实这样的提醒不止是阅读领域,在文学创作领域也同样非常必要。一直以来都有人探讨为什么我们生逢一个伟大的变革的时代,却出不了与之匹配的伟大的文学作品?这就不得不谈及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以及精神走向的问题。

品一旦出笼,其影响力就不可忽视。写出了《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的作家杨显惠在网上被不少读者称为“中国作家的良心”,《定西孤儿院纪事》记录的是发生在1959年到1962年那个特定年代的故事,有读者感叹,敢于选择这个题材,作者就是英雄。而有的读者则表示看完这本书是需要勇气的,也有读者震撼的是杨显惠的精神。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谁还会关注那些已经逝去的苦难呢?这种对天下苍生的悲悯,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应该具备,更是一个人应该具备的可贵精神,值得由衷钦佩。而杨显惠说他是个笨人,“我没有多么伟大的理想,但我想做一件事:用我的笔记录自己视野中的那个时代,给未来的历史研究者留下几页并非无用的资料。”

杨显惠注定是这个时代作家中的少数派,这样的写作并不需要太多的技巧,需要的更多是作者的良知和直面历史的勇气。而且他记录的时代和故事除了让人沉重得无话可说以外,不会带来

比如说油价高,我们非要是国际财团的投机;投行不行了,他们就说什么赌博输了。”

11月17日,中央电视台主播芮成钢做客搜狐网。